

《红旗谱》版本修订研究

朱萌萌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 要:《红旗谱》作为十七年文学的经典著作, 审美与政治结合的特征为作品引来截然不同的两种评论声音, 梁斌本人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共修订了4种版本。以梁斌红色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四个不同版本为研究对象, 整理归纳版本之间的不同之处, 并结合特殊的文学创作背景、作家主观因素和读者评论的声音来归纳版本变化情况。基于此, 选取“人物形象改动”“阶级矛盾的强化”“政治话语的修正”三板块, 研究文本重构背后的政治影响。修订经典是极其复杂的过程, 梁斌对经典的修订有锦上添花, 同时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 这是由于时代限制而无法避免的情况, 读者应该正视文本修订这一文学现象, 并挖掘其中蕴藏的文学价值, 对十七年文学作品经典化研究进行再思考。

关键词: 梁斌; 《红旗谱》; 版本修订; 政治书写

一、《红旗谱》的版本变迁

(一) 多版本政治书写比较相关问题说明

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政治与文学始终纠缠在一起, 无法孤立看待。因此, 文学作品与政治紧密联系, 在研究文学作品时, 我们需要联系时代背景下的政治状况。政治书写¹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只要与现实政治生活有联系的一切文字性产物, 包括文学性作品、政治性文献、纪实性著作都可以称之为“政治书写”。

本文对《红旗谱》四个版本的比较与分析制定了规则, 笔者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视为唯一的“固定参照系”, 采用文本对比的方法与其他三个版本的标点符号、字词、语句等方面进行比较, 并整理分类。以此更能厘清各个年代不同版本之间的变化, 为本文研究提供扎实有力的语料基础。

但由于梁斌从未对多版本政治书写的性质做过明确回应与解释, 笔者只能根据版本之间变动话语的性质和对读者阅读文本产生的影响, 尝试去做一些分类。经过分析总结, 发现各版本之间的修订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阶级矛盾、政治话语之上, 故此, 本文主要针对各版本修订中最为醒目的政治类修改, 而其他为了字词使用规范化的修改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

1. 字词使用规范化修改

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本中, 梁斌经常借引号代替书名号, 在1969年版中此类现象并无修改。直到1966年版和1978年版中, 将代替书名号的引号一律改正为书名号。如贾湘农向江涛推荐“社会科学讲义”‘毁灭’, 改为《社会主义科学讲义》《毁灭》。随着我国对于汉语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逐步规范, 对字词的使用进行了修改。例如在1957年版中“气势凶凶”在1966年后都修订为了“气势汹汹”、“年青”修订为“年轻”、“咱晚”修订为“早晚”。梁斌为了文章字词表述更为准确恰当, 对于部分字词进行同义替换。如“念叨”

作者简介: 朱萌萌(2002-), 女, 研究生在读, 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¹ 张东旭在《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论文中提到, 政治书写是指写作主体通过文学的方式关注国家政策、社会事件、历史人物的写作行为, 作者通过记录、反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 其中还包括作家们关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参见张东旭. 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J]. 中州学刊, 2020(08): 153-158.

修订为“说”、“村乡”修订为“乡村”、“战栗”修订为“颤栗”。此外，部分方言土语被现代汉语替代。如“脸蛋子”修订为“脸庞”、“黄屁股鸡”修订为“穷光蛋”、“铺盖卷”修订为“行李”。此类修改是出于规范性和审美性的需要，尚不构成修订现象。

2. 政治类修改

金宏宇在《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中提到“多数的修改本虽然也有艺术改进方面，但更重要的还是一种内容性的修改，往往是小说越来越迎合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6]，涉及到以上的修改方向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

支永碧认为政治话语的修改有五个基本特征：

- (1)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 (2) 具有明确的参与者与参与政治主体；
- (3) 具有多样的体裁形式和特定结构要素；
- (4) 具有权利工具性；
- (5) 具有时代性和社会公共性。^[7]

故此，就《红旗谱》而言，其文学修订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便是涉及意识形态领域，主要围绕着政治人物、政治话语等方面的修订，这也是本文进行多版本修订对比研究的对象。

由于作家本人对于文本内容的设计和审美需要、特定时代政治要求对创作者文艺创作的规范等原因，修改文本内容在“十七年文学”期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况，例如《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等耳熟能详的作品。就《红旗谱》而言，这部作品的版本分布和演变颇为复杂，每个版本都留下了各自不同的修订痕迹。关于中文版本在学界就包括了初版、第一版、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等说法，外文版也包括了6种版本。

本文只围绕《红旗谱》中文版本进行主要研究分析。目前，学界已达成了《红旗谱》共有四个版本的共识，但对于出版时间却持有不同看法。笔者查阅了大量文献后，将四个版本列表以供参考。

版本	版本时间	出版社
初版	1957年11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二版	1959年9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三版	1966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四版	1978年4月	中国青年出版社

表1《红旗谱》版本梳理表

二、《红旗谱》多版本中人物形象的改动

(一) 朱老忠革命形象再凸显

朱老忠作为《红旗谱》的主人公，在他父亲的影响下，他的身上一直孕育着反抗的精神品质，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学习，他开始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熟起来，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农民英雄。《红旗谱》在1957年一经发表，关于朱老忠形象的“革命农民形象”在学界展开了火热的讨论，并受到了一致好评。但是在赞扬声中依然有读者能够客观地指出初版作品的不足之处，主要问题集中在初版作品对于党的描述不够充分和深刻；朱老忠作为我党农民革命的主要人物，对于朱老忠入党前后的对比不够明显，缺少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后朱老

忠逐渐成熟的过程描写。梁斌在“文化大革命”前根据读者反馈的诸多意见对出版《红旗谱》做了两次修改，修改的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修订：面对大贵被迫当兵的观点

《红旗谱》第十一节至第十三节讲述了脯红鸟事件，冯老兰因为没有得到朱大贵和江涛的名贵鸟儿，强迫朱大贵当兵来借机报复。朱老忠在得知自己的大儿子被拉去当兵后，作者展开了一段精彩的描写。

（朱老忠）说：“好！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去吧，去当兵吧，在他们认为是‘祸’的，在咱也许认为是‘福’”^{[10]105[11]102[12]141}。

（1957年版、1959年版、1966年版）

上述段落在前三版均无任何调整，直到第四版中，作者将“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逆来。顺受。”这句话删改为“好！目前事情既然落在咱的头上，也别无它法了。也许坏事成了好事……”^{[9]122}朱老忠这一角色自出生就被作者赋予了反抗精神，在朱老巩固古钟被砸吐血身亡、姐姐被侵犯自尽后，他蛰伏三十年而后返乡只有报仇这一目的，他的阶级反抗性与逆来顺受的妥协是背道而驰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反应进行修改，把面对不公的忍气吞声变成了深谋远虑的大智慧，也更加贴合角色性格的设定。

2. 修订：对运涛革命热情的看法

出门在外打工的运涛在一次偶然中结识了中共地下县委书记贾湘农，在其不断引导下，运涛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发。回家便对自己信任的朱老忠讲述两人相识的过程。初版中的朱老忠在对革命事业表达支持后，又展现了些许担忧：“去吧！可是你去了，也要慢慢扑摸着看。”^{[10]116}

前三版对于此对话没有修改，直到1978年版梁斌将其修改为：

（朱老忠）说：“去吧！去吧！放心大胆地去吧！”“好！看样子，咱种庄稼的人们也有前途、有希望了！”^{[9]136}

（1978年版）

运涛对于是否帮助贾湘农开展农村革命工作是处于一个摇摆不定的状态，他第一时间想到了具有见识的老忠叔。1978版的对话删掉了担忧的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由摸索转变成信心与支持，朱老忠对于革命中立的态度被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所取代，展现了无产阶级对党的感情有种天然的亲切与信任。

3. 增写：对党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朱老忠在召集乡亲一起进行反割头税运动的时候，去朱老明的家里进行深入交流，想得到他的支持。朱老明早年组织群众与冯老兰打了三场官司，都以失败告终，还闹了个妻离子散的下场。朱老明得知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时，心中依旧存在疑虑。针对朱老明的困惑，朱老忠进行了简短的解释，在前三版中此对话没有变化，在1978年版的作品里，作者增加了一整段话：

（朱老忠）低声说：“大哥！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运涛那时候，我后悔咱没有找到这个门路，如今江涛可是共产党的人，咱们不能放过了，说干就是干！”^{[9]288}

（1978年版）

此时，正是朱老忠和江涛从济南回来以后，朱老忠在回家途中听到农民群众自发性发起反抗斗争。体现了朱老忠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步加深，展现了文学作品人物思想成熟的过程，为朱老忠日后积极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展开工作做出铺垫。

4. 修订：面对张嘉庆中弹时的反应

在保二师学潮中，江涛、张嘉庆等学生在学校内被困十余天，他们拒绝了反动派投降，

最后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学生伤亡惨重，江涛被反动派抓捕。朱老忠和严志和二人知晓后，前往学校寻找江涛的下落，遇到正在被反动派追捕的张嘉庆。三人在师范学校门口被岗兵发现，张嘉庆被认出后不幸中弹。四版《红旗谱》中，都对朱老忠的行为反应作出了细致的刻画。

朱老忠一看，手脚战栗个不停，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不敢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朱老忠着实气愤，心里冷得战栗，眯着眼睛看了一眼，迈开脚步走过去^{[10]235[11]451}。

（1957、1959 版）

朱老忠一看，一时气血上冲，气愤起来。抖得厉害。手脚战栗个不停，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他不能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心里说：“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等着吧！”^{[12]517}

（1966 版）

朱老忠一看，一时气血上冲，气愤起来。心里抖啊，抖得厉害。他不能去救张嘉庆，偷偷站在一边看着……心里说：“狼心狗肺的东西们，等着吧！有我们收拾你们的时候！”^{[9]531}

（1978 版）

从梁斌在 1957 版和 1959 版对朱老忠的反应刻画来看，张嘉庆被岗兵袭击中枪后，朱老忠面对敌人镇压自己的同志时充满了恐惧和怯懦，却没有丝毫愤怒，这种表现与他以往英勇无畏的形象存在偏离。在 1966 版和 1978 版中，梁斌将“不敢去”改为“不能去”，并增加了一段心理描写，体现了朱老忠对敌人暴行的愤恨与不满，在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他的一时回避是理性的考量，朱老忠冷静沉着的品质得到充分体现，也使朱老忠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梁斌在此时期，着力于塑造朱老忠勇敢高大的农民形象，“不敢”带有胆怯、退缩的意向，有损朱老忠的高大形象，巧妙的修订让朱老忠的胆量与智慧得以体现，他深刻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困难，方法也需要灵活处理，最后与冯大狗里应外合下，朱老忠和严志和成功救出张嘉庆，进一步刻画了他的先进抗日农民形象。

（二）严志和正面形象再强化

朱老忠是作家读者们讴歌的农民英雄形象，作家赋予了这一形象所有美好的积极的精神品质，“不仅继承了古代劳动人民的优秀质量，古代英雄人物的光辉性格，而且还深刻地体现了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革命精神”。^[13]

但是严志和作为农民形象，却没有朱老忠身上闪亮的精神品质，他代表着中国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典型农民形象。他善良忠厚、谨慎小心，只想保住父亲出走前的“宝地”，让一家五口没有温饱问题。严志和第一次具有抗争性的活动与四十八村民一起状告地主冯老兰。可接连的失败，让他们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薄弱。后来，大儿子运涛在济南被捕，为了凑够看望儿子的路费，他不得不把父亲留下的“宝地”贱卖给地主冯老兰。他的母亲也因为运涛被捕的噩耗刺激后不幸去世，生活带给他沉痛的打击。现实的被逼下，严志和接触到了共产党倡导的土地改革政策和社会的美好蓝图，所以他怀揣着对未来的向往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在前三版《红旗谱》中对于严志和形象没有特别修订，1978 版对严志和形象修订最为突出，彰显了农民群众的爱国形象。

1. 删除：乞求冯老兰借钱情节

当严志和得知大儿子严运涛被捕入狱时，严志和凑不齐前往济南的盘缠，只能选择向地主冯老兰借钱。冯老兰尽显地主阶级的贪婪本色，借机向严志和讨要“宝地”。1957 版中严志和只能乞求中间传话的李明德，“你跟老人家说说，帮补俺这一步。”^{[10]1591978} 版则删除

了严志和称呼冯老兰为“老人家”这一内容，这一改动也说明了严志和面对地主冯老兰时，视对方与自己是平等的，体现了鲜明的阶级意识。

2. 删除：体现形象胆小怯懦内容

在1957年版中，严志和看到第二师范学生被反动派血腥镇压后的惨状，他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但是在后来1966年版、1978年版都有不同的删改。

严志和实在不忍离开，心里说：“人，见死能不救……”话是这么说，他不敢走近，一走近了，就有人吓唬他。^{[10]235}

（1957版）

（严志和）：“人，见死怎么能不救呢……”……，他不敢走近，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自己被捕了，也救不下他。^{[12]517}

（1966版）

从1957版和1966版可以看出，1957版的语句是陈述句语气，1966版巧妙运用了反问句式，使情感更为强烈。1978版更是删除了这段心理描写。严志和不敢走上前去的原因从害怕被敌人伤害变成了自己没有能力与敌人抗衡，为他的行为合理化。删除了他胆小怯懦的行为，打造了抗日群众有勇有谋的正面形象。

《红旗谱》前三版的第57节主要讲述了严志和在看到第二师范遭到血腥镇压和得知二儿子江涛被捕后，独自走在河边想要寻求自杀的情节，细致地描写了严志和悲痛欲绝下的一系列心理活动：

“我好命苦呀！”“天哪！我再也没有活路啦！”“如今身上更是沉重”“唉！我严志和也该轻松轻松了！”^{[10]439-441}

（1957年版）

严志和面对自己命运不公、前途渺茫时，想用自杀来解脱自己。但是1978年版中，梁斌删去了上述文字，严志和做出了截然相反的举动：

“阶级敌人好歹毒啊！”“天哪！不许人们抗日，我们的祖国要亡了！”“祖国要亡了，要当亡国奴了”“抗日的人有罪？实无天理！”“也许，我们的祖国不会灭亡！江涛和运涛还会回来。”^{[9]535}

（1978年版）

严志和思考的内容从个人家庭转到了抗日群众和国家的安危，思考的深度也逐渐提升。他从担心自己面临的苦难转变成抗日事业和中华民族在抗日过程中的存亡。“亡国奴”体现了他正站在祖国主权民族独立的角度上担忧，将个人与国家民族命运绑在一起，并且对祖国充满信心。

3. 修订：对抗战前景的态度

严志和放弃投河自杀后，朱老忠带他回到了二人落脚的旅店，并与愁苦中的严志和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前三版对于该对话内容没有特别改动。在1978版修订中，梁斌删减了前三版内容，更加着重描写了二人抗日斗争的决心方面，具体改动如下：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两个孩子在监狱里，有谁去照管，你就忍心吗？”！ [10]442	“抗日的人有罪，我们中华民族就算完了！” [9]535
2	“我混蛋！我傻死了！这是做的什么梦？” [10]443	“有我们的党在，中华民族不会完的！” [9]535
3	“关起我的运涛，拿了我的‘宝地’，如今又要关起我的江涛……” [10]443	“我们是不会当亡国奴的！” [9]536
4	“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常说……就能挣扎，就能活下去。” [10]444	“回去我们就要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鬼子！” [9]536
5	“老朋友！我，我活不成啦！” [10]536	“你也别开这个店了，咱们一块去打日本鬼子吧！” [9]537

表 2 朱老忠、严志和二人对话内容修订对比

序号 1 和序号 4 是朱老忠劝说严志和的内容，其他是严志和的回答。在前三版中，二人对话的核心都是从个人视角出发，1978 版将二人讨论的核心放在抗日斗争、民族存亡层面上。

前三版的序号 2 和 3 展现了一位绝望的农民形象，字里行间都在提醒自己的儿子、土地、家庭受到了迫害。1978 版中，严志和整体的情绪是高昂的，塑造了一位坚强不屈的抗日群众形象。在朱老忠的宽慰下，严志和对共同抗日充满着激情和活力，不同前三版中的自怨自艾，更多展现出坚定的抗日信念。

（三）抗日青年学生形象的再完善

1. 修订：抗日活动策略重心调整

梁斌曾在《〈播火记〉再版后记》中提到：“这样庞大的群众运动自发性很大，免不了会有缺点、失误，但广大群众是英勇的，他们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 [14]307 抗日青年学生的着重描写集中在保二师学潮活动中，青年学生面对敌人的封锁丝毫不妥协。

1957 版中，抗日青年学生都支持将在乡学生召集回学校进行斗争，1966 版中仍然保留了这一情节设计。1978 版中，对于进一步的抗日思路形成了“回乡抗日”和“在校抗日”两大阵营。江涛等人认为应该走出学校回到农村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夏应图等人认为应该将在乡的同学召集回来继续开展护校运动。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跑什么，又没偷人家，没摸人家的。” [10]352	“你说不应该回来，我也说不应该回来，群众要回来，老夏坚持要回来！” [9]428
2	“不要紧，怕什么哩？” [10]352	“没办法，群众劲头大，我现在是身不由己。” [9]428

表 3 江涛对于在校抗日的回答内容对比

表格内容为江涛对于“回乡抗日”和“在校抗日”的回答，在 1957 版中，江涛是完全支持“在校抗日”的思路，随后两版中也只是对个别字词进行调整。1978 版则体现出江涛对于回乡的赞同，留校的选择是面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妥协，他在留校期间一直劝说同学们“回乡抗日”，特别是说服夏应图的思想不断转变。

序号	1957、1959、1966 版	1978 版
1	“不能把敌人看得那样无能……强迫我们服从他的制裁，也要形成鲜血！” ^{[10]352}	“不能把反动派看得那样善良……他要逮捕我们，……，强迫我们服从统治者的制裁，把我们做为坚决抗日者，进行镇压。” ^{[9]357}
2	“最后，他要逮捕、枪毙我们不是吗？” ^{[10]357}	“我看，这些反动派是要逮捕我们的” ^{[9]357}
3	“为什么过来过去光是流血？” ^{[10]352}	“这样，他们就是替日寇屠杀抗日同胞了？” ^{[9]433}
4	“我还不忍这样想，我还不愿离开。” ^{[10]412}	“我还不忍这样想……。” ^{[9]501}

表 4 江涛对于在校抗日的回答内容对比

序号 1、2 是江涛的想法，序号 3、4 是夏应图的看法。江涛犀利指出夏应图对于敌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敌人不会采取实际行动，在序号 3 中，夏应图对于当下局势的判断有了变化，他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是残忍暴力的反动派，对于坚守学校的策略产生了动摇，“在校抗日”的思想逐渐瓦解。

2. 删除：小魏形象的软弱性消除

对于小魏这一人物形象，前三版无太大改动，小魏是一位动摇的知识分子，梁斌在 1978 版将小魏重构成一名抗日进步青年的形象。首先改动了小魏的家庭情况，在前三版中是这样描述的：

“父亲当团长……爱人儿娇滴滴的，挺漂亮。他就时刻不愿离开她……成了有名的爱睡老婆的。”^{[10]362}

（1957 年版）

“父亲是中学教员……爱人儿长得挺漂亮，思想也挺进步。每次假期……两个人并肩作战，在乡里开展工作……秘密发展农民协会，妇女协会……”^{[9]439}

（1978 年版）

小魏的家庭情况从落后的官僚家庭修订成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家庭，删去了小魏对于妻子的依恋，重构了一名独立的抗日青年形象，为小魏在乡村开展抗日斗争工作做铺垫。

在保二师学潮中，反动派将学校层层包围，校内人员因缺少粮食饱受饥饿。在前三版中，小魏依然是一名软弱的动摇人物，在身心饱受摧残的时候，他心想“还不如听母亲的话，早早离开这里，转学到北京去。”他把站岗的工作视为“苦刑”，种种想法都印证着小魏是温室家庭长大的孩子，即使他嘴里一直在强调“共产党我是拥护的”，面对困苦他却只会抱怨退缩。在 1978 版中，梁斌删除了所有关于小魏负面形象的内容，小魏的中立摇摆和软弱被遮蔽，让小魏从一名动摇知识分子形象转变为抗日青年进步知识分子，他也成为“回乡抗日”的支持者。回乡的理由由逃避学校被困的逆境变成根据抗日形势做出的思考，增强了小魏的理性和进步。1978 版中，小魏成功逃出学校奔向广大农村，许多抗日青年学生也走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动员，再次强调了“回乡抗日”的战略正确性。

三、《红旗谱》多版本中阶级矛盾的强化

张羽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她在 1955 年 9 月 27 日《〈红旗谱〉的审读意见》一文中就指出，“在高蠡游击战争中……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写得不够，因而暴动的气氛就感到不足了”。^[15]在随后的两个修订版中，梁斌对此做出了部分调整和修改，将阶级划分更加明确，特别强调了冯老兰和冯贵堂的阶级特性，将日常话语转变为阶级话语，强调了农民的阶级认同，不断突显对立阶级的对立特征。

（一）重新划分阶级敌人

《红旗谱》中主要人物可以分为农民、地下党、地主、民国政府四类。但是农民也有中农、贫农、佣农之分。梁斌将这些复杂的关系概括为穷富斗争、国共斗争的两大底层逻辑。

在前三版中，阶级敌人主要讲述了冯老兰一人的种种罪行，1978版将阶级敌人重新分类组合，梁斌把蒋介石反动派、封建势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列为阶级敌人。贾湘农为运涛讲解国内阶级敌人现状时，前三版却只提到了“腐朽的军阀政客们”，直到1978版中，梁斌才将封建势力纳入革命对象的行列里。

“反割头税”是贾湘农和江涛联合群众发起的第一次革命斗争，贾湘农给江涛讲割头税不合理性时，前三版提到的阶级敌人被“有人”二字草草带过。但是1978版中，贾湘农对阶级敌人的描述做出了详细介绍：

“蒋介石颁布割头税……是为了剿共。而包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们，是为了赚一大笔钱养家肥己……土豪恶霸们……”^{[9]256}

（1978年版）

从1978版中可以看出，贾湘农对于当前国内复杂的社会关系有着清晰的认知，使阶级敌人形象更为具体，为农民接下来进行革命斗争理清思路，揭露了冯老兰和冯贵堂等人丑陋的嘴脸。特别是提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一群体，将蒋介石为代表的敌人和冯老兰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联系起来，体现出梁斌对于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有着正确清晰的认识。

（二）强化敌人阶级特性

1. 增写：地主的封建性特征

冯老兰的反派形象贯穿作品始终，他的身上更多的是中国传统封建地主的性质。在1978版中，梁斌着重笔墨写出冯老兰封建思想的思想根源，特别是冯老兰对压榨农民的行为进行了自我美化：

他们都过起舒服日子来，谁还死心受苦？……过个财主不是容易！^{[9]81}

（1978年版）

他从封建社会里过来，在封建思想的支配下，他总结了多半个世纪的经验，对于《朱子治家格言》，他背得滚瓜烂熟……他的思想僵化了。^{[9]82}

（1978年版）

他将自己处心积虑压榨农民的行为美化成自己节俭用度的习惯，认为农民为他死心塌地地受苦是理所当然，也侧面体现出当时农民被封建势力压迫下的奴性，亟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推翻阶级敌人。

冯老兰经历了中国社会性质从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但是在他的思想中，封建传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梁斌对于冯老兰好色、阴险毒辣的形象进行了放大处理，重点表现在对于想霸占春兰等情节中，从他思想、爱财如命、物化女性、奴役农民等方面进行描写，使他的封建地主形象更加完整。

2. 增写：新型地主的资产阶级特性

在作品中，冯贵堂是一名出生在封建地主家庭而后接受了法科教育的大学生，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孕育出的产物，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代表。

冯贵堂得知朱老忠回乡后，给冯老兰分析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他希望冯老兰不要和农民群体再产生敌对矛盾，这也体现了冯贵堂较父亲有着先进的阶级认识。但是作者此时在文中加了一段对冯贵堂此人的评价，以全知视角暗示了冯贵堂无法摆脱的阶级局限性：

他虽然上过大学，有了一些文化，但阶级本质决定他，他还不懂得阶级这两个字的含义。^{[9]79}

（1978年版）

对于冯贵堂身上所存在的“资产阶级”性质，作家在1978版中增写了许多细节。

日本维新才多少年，事业上发达得多……快要按着书本上，学着外国的方法耕种土地。^{[9]478}

(1978 年版)

冯贵堂一心致力于将父亲的资产进行改良，前三版中只是简单提到“他的主张”，1978 版中补充为“改良主义的主张”，冯贵堂不断给父亲讲述日本“维新变法”“外国耕种土地的方法”，强调了他主张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革命主张不同，改良主义主张调和，特别是对生产方式的改进。但是在先进的思想背后，依然是以榨取劳动力为获取价值的生产方式。其本质仍是以剥削农民为本质的运作模式。冯贵堂身上背负着资本主义、改良主义、新型地主等形象特征，重新建构了“大资产阶级”的典型形象。

四、《红旗谱》多版本中政治话语的修正

(一) 无产阶级形象话语修订

1. 修订：对革命主体称呼

梁斌在 1978 版中着重梳理修改了对革命主体的称呼，表明了自己无产阶级的立场。运涛向朱老忠倾诉自己与贾湘农相识，他的革命热情被其点燃，朱老忠对于运涛的想法表示支持：

(朱老忠)：“……穷苦人翻起身来……你要是扑到了这个靠山，……也许扑摸
对了。”^{[10]136}

(1957 年版)

(朱老忠)：“……工人和农民翻起身来，如今也到了咱的脚下。你要是扑摸到
这个靠山，……也许扑摸到共产党的门口……”^{[9]136}

(1978 年版)

初版作品中，朱老忠讲革命主体是“穷苦人”，在 1978 版中修订成“工人和农民”。在 1978 版中，朱老忠具有了初步的革命视野，并且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工人和农民的靠山，人物也更加具有无产阶级意识。

2. 修订：朱老巩保护古钟的目的

《红旗谱》的开篇讲了朱老巩为保护古钟大闹野猪林。在 1958 版中，朱老巩从保护自己的家族出发，在 1966 版和 1978 版中将其目的修订为保护阶级的利益。

他们祖辈几代都是仇家，看样子朱老巩要报仇了。^{[12]40}

(1966 年版)

有胆量的人，要为四十八村的人抱不平了。^{[9]8}

(1978 年版)

可以从 196 版中看出，梁斌补充了两个家族积怨已久的背景，为朱老巩行为增添了合理性。在 1978 版中，朱老巩的行为是为了保护整个村民，代表着集体而斗争。作者将朱老巩护钟的目的从个人利益修订为集体利益，提高了农民英雄的思想觉悟。

对于护钟目的内容的修订也影响了朱老忠复仇的动机。虎子曾亲眼看到父亲站在村民前面保护古钟的英勇事迹，对冯老兰的仇恨深植于心中。在 1957 版中，朱老忠讲道：“我得回去报这分血仇”^{[10]16}。在 1978 版中，修订为：“我也要回去为咱四十八村的人报这分血仇”^{[9]20}。梁斌将朱老忠“为父报仇”修订成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复仇。将个人仇恨进行升华，并延伸到整个阶级后代。

(二) 重构运涛对党的认识

运涛在贾湘农的教导下，不断学习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革命理论，帮助农民从阶级压迫下觉醒，带动农民不断进步和成长。梁斌在前后版本中不断重构运涛对于共产党的认识，表

明其无产阶级立场。

类别	1957 版	1966 版	1978 版
党的性质	穷人党	穷人们的党	为咱穷人谋幸福的
革命形式	管理自己的事情	管理自己的事情	解放自己
革命目标	不再受人欺侮	不再受人欺侮了	不再受人压迫、受人剥削了

表 5 重构运涛对党的认识

从党的性质来看，由“穷人党”慢慢变为“为咱穷人谋幸福”的党，革命形式从“管理自己”变成“解放自己”，农民和工人要想获得自由必须有斗争的自觉性。他的认识从农民从被“欺侮”到被“压迫、剥削”，说明了运涛明白生产资料的私人制的所属问题，体现了运涛的思想逐渐成熟，对于阶级关系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三）删去对“路线问题”的描述

《红旗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了猛烈抨击，“文艺黑线专政论”向当时许多文艺工作者强加“黑理论”“黑作家”“黑作品”的诬陷，“四人帮”禁止《红旗谱》进行再版，认为梁斌在创作中拥护王明路线并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称其为“黑旗谱”。梁斌后来曾表示：“我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从路线斗争的角度去表现和塑造人物。我歌颂的是广大工农群众、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歌颂他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蒋介石反动派投降卖国政策的英勇斗争。”^[16]

第 54 节讲述了江涛和老夏讨论二师护校运动的策略问题，江涛意识到老夏与自己的想法有所矛盾：

敌人策略上有新的变化，他（老夏）还是停留在旧的路线上……使斗争走到目前的困境……旧路线的时代虽然过去，旧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11]414}

（1957 版、1959 版、1966 版）

到了目前，蒋介石反动派在策略上有了新的变化，可是他（老夏）还是停留在旧的观念上。^{[9]504}

（1978 版）

梁斌在第四版中删去了之前提到的“路线问题”这一概念，从现下读者视角来看此处修改是必要的。前三版中提到“旧路线”“新路线”“旧思想”“新精神”相关词汇，但是梁斌并未对以上词汇作出具体的解释和说明。“二师护校运动”发生在 1932 年 9 月，此时我党主要战略决策是由王明路线引导，江涛无法脱离时间限制对其作出新旧的评判。因此，梁斌对于作品这一调整是更符合文本情境的。

结语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政权在确立后需要在文艺作品上来鼓舞人们对建设新社会充满激情与信心，叙述新生政权的现实合法性，该时期的文学带有民族国家的想象意味，文学作品的角色往往与国家和社会紧密联系，以个人的发展隐喻国家的发展方向，因此梁斌的《红旗谱》在时代中应运而生。

《红旗谱》中三代农民的斗争故事代表着三个不同时代。朱老巩代表着传统农民自发斗争，因为时代和个人思想的限制注定了结局的失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群体代表着第二代农民，他们从为家族复仇的使命转变成为阶级复仇。第三代的代表则是二代农民的孩子，

他们经过学习无产阶级先进理论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集合着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力量进行斗争和反抗。分析《红旗谱》需要结合“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而在此作品中,主人公就是第二代农民代表朱老忠。梁斌对于朱老忠的定位从来不是静止的人物形象,他的身上肩负着两个时代的使命和要求。在贾湘农和江涛等人的启蒙引领下,朱老忠逐渐学习—接受—实践革命进步知识,深受无产阶级思想的启蒙。

对于朱老忠来说,个人的“成长”更多代表着时代的发展和走向。我们需要从“成长小说”的特殊要求来分析这一人物形象。由于作品中带有的特定时代的政治意识,必然会随着政治意识的波动和变化受影响。梁斌在时代发展、个人思考和读者声音中,对作品进行了3次修订。《红旗谱》的4个版本中,修改变动最大的当是1978版。从标点符号、章节段落到人物形象、情节设置,通过各处变化,反映的是作家在力求塑造伟大的革命者形象,歌颂农民英雄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英勇无畏的精神品格,政治类话语修改比重逐渐上升。文章通过对《红旗谱》四个版本中政治话语相关部分的修改情况重点分析,从而研究《红旗谱》不同版本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文本话语内容的政治性逐渐增强。

笔者从人物形象、阶级矛盾、政治话语三方面分析,通过对不同版本文本进行细读,列出梁斌对作品修订、增加、删减不同现象。例如,在前三版中对于“路线问题”中提到“旧路线”“新路线”“旧思想”“新精神”,梁斌认识到人物在当下时代的限制,无法对革命路线做出新旧评判,对此删掉此类描写,更加符合逻辑关系,这是正确的。对于阶级敌人形象完善和刻画也更好理清了中国社会矛盾交错的本质关系。但是在“脯红鸟”事件中,删去了朱老忠面对儿子被迫征兵的消极想法,修改了朱老忠对运涛革命热情的看法。即使是为了拔高农民英雄的高大形象,但是忽略了人物性格和思想发展的客观过程。朱老忠在当时的情境下,是一名从未受过革命思想影响的传统农民,面对亲人离去的打击产生无奈和消极的情绪是情理之中。在第四版中对于严志和的形象修订也存在此类问题。当严志和看到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儿子也不见踪迹的时候,产生自杀的逃避想法实属正常。结合全文,对于严志和的描写更多的是一名懦弱善良的农民,只想守住自己的宝地。第四版中将他自杀的原因从儿子被捕变为对革命失败,自己不愿做一名亡国奴。前三版中对于严志和想自杀并进行自我思想斗争的描述更为符合人物形象。虽然梁斌在第四版中着重笔墨去提高朱老忠和严志和的形象,但此次改写并不符合人物发展规定。

综上所述,《红旗谱》的修订是作者在作品人物形象、阶级对立、政治话语的反思基础之上,通过修订人物命运、完善人物形象、阶级斗争来层层铺垫,揭示了作家对于作品精雕细琢的审美情怀。修订经典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梁斌对经典的修订有锦上添花,同时也会出现矫枉过正的问题,这是由于时代限制而无法避免的情况。无论成败,这些都是宝贵的研究素材,我们应该正视此类文学现象,并挖掘其背后的文学价值,对十七年文学作品的经典化历程进行再思考。

参考文献:

- [1] 郭文静.《红旗谱》新旧版本的比较[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
- [2] 张立.《红旗谱》的老版本[J].中国商报,2007(11).
- [3] 田英宣.谈《红旗谱》的版本[J].燕赵学术,2009(02).
- [4] 龙瑶.《红旗谱》版本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 [5] 龚奎林.“故事”的多重讲述与文艺化大众[D].河南大学,2009.
- [6] 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4.
- [7] 支永碧.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语用预设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0.
- [8] 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

- [9] 梁斌. 红旗谱[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 [10] 梁斌. 红旗谱[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7.
- [11] 梁斌. 红旗谱[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 [12] 梁斌. 红旗谱[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6.
- [13] 《文艺报》编辑部编. 文学十年[M]. 北京: 中国作家出版社, 1960.
- [14] 梁斌. 梁斌文集(第6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15] 张羽. 《红旗谱》审读意见[J]. 编辑之友, 1985(01).
- [16] 梁斌著. 播火记[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485.
- [17] 李杨. 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18] 支永碧. 基于语料库的政治话语语用预设研究[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0.
- [19] 金宏宇. 新文学的版本批评[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 [20] 蓝爱国. 解构十七年[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1] 贺桂梅. “50-70年代文学”研究读本[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
- [22] 师晓晖. 文学出版与“红色经典”的“经典化”历程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 [23] 郭剑敏. 革命·历史·叙事——中国当代革命历史小说(1949—1966)的意义生成[D]. 浙江大学, 2006.
- [24] 孙伊莉. 《红旗谱》革命经验叙述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 2021.
- [25] 王雪力. 梁斌《红旗谱》修订机制研究[J]. 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2022(04).
- [26] 聂晶晶. 论《红旗谱》的多重叙事[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06).
- [27] 田英宣. 《红旗谱》老版本证疑[J]. 沈阳大学学报, 2008(03).
- [28] 王平, 周悦三. “农民革命”历史叙述的精神向度——再谈《红旗谱》[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04).
- [29] 罗先海. 新时期文学版本研究的问题、资源与路径[J]. 文艺理论研究, 2024(01).
- [30] 罗先海, 金宏宇. 版本视域下的“十七年”长篇小说[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8(02).
- [31] 刘奎娇. “十七年”时期中国长篇小说出版研究[D]. 北京印刷学院, 2014.
- [32] 邓声国, 龚奎林. 论“十七年”小说版本的内容修改[J]. 小说评论, 2011(06).
- [33] 龚奎林, 黄梅. “十七年”小说版本修改的原因考察[J]. 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1).
- [34] 田英宣, 张凤燕. 《红旗谱》研究五十年述评[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A Study on the Revision of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Red Flag"

ZHU Mengmeng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Shaanx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s a classic work of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1949-1966) in China, "The Red Flag" has attracted two distinctly different types of critical opinions due to its characteristic combination of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Liang Bin, the author, revised the work four times between the 1950s and 1970s. This study takes the four different editions of Liang Bin's red-themed novel "The Red Fla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summariz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edition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across versions by integrating the specific literary creation context, the author's subjective factors, and readers' critical opinions.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selects three dimensions—"modifications to character images", "strengthening of class contradictions", and "revision of political discourse"—to explore the political influences behind the textual reconstruction. Revising a classic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process. Liang Bin's revisions to this classic have both enhanced its merits ("adding flowers to the brocade") and led to overcorrections. Such issues were unavoidable due to the constraints of the times. Readers should face up to the literary phenomenon of textual revision, explore the literary value contained within it, and rethink the research on the canonization of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Seventeen Years Literature" period.

Keywords: Liang Bin; "The Red Flag"; edition revision; political expression